

张俊峰：舍身抗日 淬火成钢

□记者 王锦春 张洪涛 王吉城

(上接 5 版)

抗日烽火中显本色

据记载,1938年6月6日,日军侵占太康县城。6月9日,国民党当局悍然掘开了花园口大堤,使黄河水奔腾直泻,豫皖苏40余县被淹,数以千计的无辜群众丧生。此时,张俊峰已率“长白话剧团”返回太康。

1939年9月,中共太康县委在牌坊杨村建立,张俊峰任书记,王舒然、王法洲、孙占和为委员。此时,全县党支部发展到9个,党员65人。为便于领导,年底,张俊峰决定成立县北地下区委,分管王集、耿庄等5个支部的工作,使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完善。地下县委成立后,张俊峰率领党员和干部,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,扩充了武装力量,建立了7个抗敌自卫分团,成立了新四军太康独立中队,全年还向主力部队输送了400余名干部和战士。

1940年春,张俊峰已经身患肺病,并且日益严重。为此,地委决定派马一鸣主持太康县委工作,由张俊峰担任太康县委组织部长。一个月后,马一鸣调睢杞太独立团任政治处主任,太康的工作仍由张俊峰负责,直到当年7月刘振邦来太康任县委书记。期间,他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,带病坚持党的工作,打击敌人。刘振邦来太康后,张俊峰积极配合其工作,搞好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。

为了便于开展工作,张俊峰就让妻子跟着做掩护,把大儿子张克强放在亲戚家。一次,儿子得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,妻子就希望把儿子接回身边,可是张俊峰却不同意。他说:“就自己的孩子金贵,你没看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因没钱医治死去吗?”

张克强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,那时,母亲领着他们,整天在县北一带的农村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,被敌人追捕过很多次,敌人曾扬言:“抓住张俊峰一家,鸡犬不留、孩娃不留。”

在这种形势下,张俊峰的妻子想把孩子安排到外地学习,一方面防止发生意外,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学点文化知识。可是,张俊峰却说:“就是因为是自己的孩子,就得一定安排到安全的地方读书吗?牛腿只许人家的孩子去打吗?”从此,他的妻子再也不提家庭安危和孩子上学的事情了。

张克强回忆说:“1940年夏天,闫斌叔叔因身份暴露,就领着斌婶到我们家。当时,我们家搬到杨庙北的卢庄没几天,就被汉奸知道了。一天上午,敌人突然包围了卢庄。母亲发现后,先让斌婶领着小弟(张怀安)逃出家门,母亲没来得及逃走,被敌人包围在住处附近。之后,斌婶和小弟被敌人赶到打麦场上审问。当时,小弟因饿了回家找妈妈,却被汉奸发现了。于是,斌婶前去冒险认领,汉奸怀疑斌婶,就把她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。因斌婶不承认自己是新四军家属,敌人无奈,只得把浑身是伤的斌婶放了。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,

责怪母亲不该让斌婶受摧残,当母亲向父亲说明是发现敌情先让斌婶走脱时,父亲才心平气和地说,遇到危险时,宁可被捕牺牲,也要保护革命同志和群众。”

据《周口党史人物志》记载,1941年1月,皖南事变爆发后,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,日伪顽匪一起向睢太地区大举进攻,对敌斗争形势更加严峻。

危急关头,张俊峰带领太康的党组织,克服重重困难,使革命转危为安。由于根据地的缩小,日伪又在各重镇安上了据点,因此县委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,有时开一次会议就要转移好几个地方。

有一次,张俊峰和王法洲、杨■在王集开会,突然被日军包围,他们立即分头突围。张俊峰和警卫员任玉金向王集东南方向转移,不料被日军骑兵发现。快到蔡庄时,任玉金不幸负伤(后牺牲),张俊峰继续向蔡庄方向突围。他越过壕沟,翻墙过村,甩掉敌人,安全脱险。

对于这件事,张克强在回忆中这样说:“父亲脱险后,母亲问父亲和日军搏斗时想没想到死后老婆孩子怎么办?父亲却说,自己家倒没想,只是想到很多要办的事情还没办,要安排的事情还未安排,难道就这样完了吗?”

在工作中,张俊峰表现出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,让人心生敬畏。在生活上,他对待革命同志像亲人一样,为人称道。张克强回忆说:“早期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于焕堂父母无人照顾,父亲就把他们接到家中照顾,直到局势好转,才托人把他们送回家中。”

张克强说,由于时局变动,他们多次搬家,可无论走到哪里,家里总有“客人”到来。他的母亲总是把“客人”当亲人看待。他的父母平时省吃俭用,但对待“客人”却很大方。有一次,他的父母弄到一条鲜鱼,却撒上盐挂起来,专等“客人”来了才吃。在“客人”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要想吃得好,去找俊峰嫂。”

在和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,张俊峰和王法洲动员积极分子、进步青年参军,成立了太康县抗日联防大队,寻找机会打击敌人。在斗争过程中,他还招收了一批新战士入伍,让党的组织、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。

经过几个月的斗争,太康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,国民党的围剿不但没有把共产党人杀绝,相反,太康县委带领党员和干部,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,渡过了难关,并配合全区的抗日武装,袭击了日伪顽匪,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,人民的武装更加壮大起来。1941年6月底,太康县武装力量发展到200多人,并重建了太康县大队。

1941年10月,张俊峰调任水东独立团军需处主任。之后,他拖着病体四处奔波,为部队筹粮筹款,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。

张克强回忆说:“当时,组织上经济比较困难,所需枪支弹药有相当一部分得通过各种渠道购买。有一次,因没钱买枪,父亲就叫母亲回家卖地筹钱。”

由于生活艰苦、工作任务重,得不到休息和治疗,张俊峰的肺病更加严重。白天,他背个钱箱为筹粮筹款奔走;晚上,他还要工作到深夜。同志们都被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感动,也为他的病情担忧。

张克强回忆说:“当时,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,他的战友和亲友要给他生活上补贴点,到一个地方要给他单独做点好饭,每次他都断然拒绝。一次,有人用公款偷偷给他买了点较

贵重的药,他知道后非常生气,严肃指出:‘公家这么困难,绝对不能用公家的钱给我买药吃!’他病得实在不行了,就到我二姑家,让二姑父找土方治疗。”

1943年中秋节后,张俊峰的病情进一步恶化。当年10月的一天,张俊峰的妻子抱着一线希望,拿着借来的80元钱,找来了一辆平头车,将张俊峰送往商丘医院。很快,带来的钱花完了,可张俊峰的病情仍无好转。地委领导知道张俊峰的情况后,立即派杨■和李正风等人前往他家看望。当时,张俊峰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见此情景,李正风、杨■立即派人去开封为他拿药。可谁料到,药还没取回来,张俊峰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。

1943年11月,张俊峰在太康县芦庄村病逝,时年30岁。

兄弟二人替父“还债”

采访当日,记者一行在太康县城关镇一处普通的院子里,见到了张俊峰的二儿子张怀安,听他讲述张俊峰的点点滴滴。记者眼前的张怀安满头白发、步履蹒跚,回忆起张俊峰的往事,他一度哽咽。

张怀安还有个名字叫“访清”,说起这个名字的来历,张怀安深有感触地说:“革命战争年代,我们家没有固定的居所,到哪儿都不敢常住,母亲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‘访清’,意思是到哪儿住都要访问清楚是不是自己同志家,是不是安全。”

张怀安说:“父亲去世后,敌人看见身上穿孝服的人就抓。当时,母亲在我姨家住,村子被包围后,母亲就躲到了一个老太家里。”

看见敌人马上就要过来了,张怀安的母亲藏在屋子里,对老太太说:“大娘,我给你烧火做饭,你千万别让他们进来啊。”于是,张怀安的母亲穿上老太太的衣服坐在灶火前烧锅,老太太就光着后背坐在门口。当敌人来询问时,老太太说:“我闺女在屋里烧水做饭,她害怕兵。”敌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。

“此后,我们一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,经常在革命同志家暂住,在颠沛流离中,我和哥哥也长大成人。”张怀安说,“新中国成立后,我们作为烈士后代,得到了党组织的照顾,哥哥上了大学,去外地工作,我在太康县当上了老师,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”张怀安的母亲经常对张怀安兄弟二人说:“当初你们父亲闹革命时,许多乡亲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,这些人是我们家的恩人。咱一家可不能忘记

恩人,你父亲欠下的人情债,你们兄弟一定要记得还啊!”

此后,张怀安兄弟二人便按照母亲的叮嘱,一边工作,一边“替父还债”。警卫员任玉金在跟随张俊峰突围的过程中,不幸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,张怀安一直与任玉金的后人保持联系,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。

当年,张俊峰和战友在王集乡一个村子里开会,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子,此时,一个名叫刘小的村民,将张俊峰一行人藏到自家房子的套间里,他机智地应付,救了张俊峰一命。

很多年后,张怀安从母亲口中得知了这件事,他便找到刘小的家,坚持逢年过节去看望,一直没有中断过,直到刘小的爱人去世三周年。

为寻找曾帮助过自己的闫斌及其家人,张怀安多次到开封,可至今仍未能找到,这让他很遗憾。

“父亲对组织、对革命同志诚心诚意、谦虚谨慎,对自己、对家庭克勤克俭。母亲给父亲做的新被褥、新衣服,他不止一次送给有困难的同志。”张怀安说,“母亲的一生很苦,可是母亲的觉悟很高,通情达理,她一直默默支持着父亲的革命活动。等我逐渐长大后,她经常给我讲父亲的革命故事,让我为父亲感到由衷的自豪。”

张克强和张怀安的回忆中,有这样一句话让人深有感触:“父亲在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,历经艰险,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,为抗日时期太康县党组织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如今,他的革命精神,始终激励我们不断前进。”